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思想理论根源

蒯大申

[摘要] 制度是思想观念的外化。要深入了解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须先考察其思想理论根源。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指导思想的确立,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认识,其核心是关于文化的功能定位问题,第三是关于文化与人民关系的认识,第四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认识。党对上述四个方面问题的认识,构成了党的基本文化思想和文化理论。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及其背后的基本文化理念在延安时期已臻成熟,延安时期形成的文化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性质、基本特征和基本面貌。

[关键词]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思想理论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0)02-0012-09

毛泽东曾说过,研究中共党史,只从1921年讲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必须重视此前的历史发展,“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1](p.402)}研究、考察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同样不能仅从1949年讲起,也应该重视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应该将其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梳理历史发展脉络,追寻其思想理论根源及其流变,就是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通过了解过去而更深入地理解现在。

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支持这些制度的思想理论。一定的制度是一定的思想观念的外化。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指导思想的确立,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认识,其核心是关于文化的功能定位问题,第三是关于文化与人民关系的认识,第四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认识。这些思想理论观念具有强烈的党性色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其文化理

念就以鲜明的党性色彩特立独行于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本文选择从延安说起^①,是因为延安时期^②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文化理念、指导方针、领导体制及相关政策基本形成的时期。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及其背后的基本文化理念在延安时期已臻成熟,延安时期形成的文化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性质、基本特征和基本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体制在全国范围的延伸和推广。因此,要深入理解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须先考察上述思想理论根源。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左翼,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此即毛泽东所

作者:蒯大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①有的部分则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②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保安迁驻延安。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23日中央领导机关东渡黄河前住华北,中共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近13年。史称“延安时期”。

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p.1471)]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最早被介绍和研究的是唯物史观,因为这一理论与社会革命的联系最为密切,最契合中国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新青年》是十月革命后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陈望道也于1920年8月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李大钊曾描述当时思想界的风气:“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3]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也热情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并倡议组织共产党。在9月16日的信中,他又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寻找出唯物史观,“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4](p.153)]毛泽东则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断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4](p.162)]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即把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放在重要地位。^①但由于早期共产党人大都投身于实际革命运动,加之当时环境险恶、斗争残酷,相对忽视了理论研究。^②大革命失败后,党深切认识到革命理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性,于是下决心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5](p.422)]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再次强调:“党必须有计划地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著”,并提出党的机关报要“经常担负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指导在实际问题中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6](p.270)]

中共中央到延安后,客观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适应抗战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党中央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们的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7]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8](p.53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8](p.533)]“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8](pp.532-533)]“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1921年11月):“中央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②冯乃超曾总结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们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弱点,主要是缺乏理论指导。因此觉得,很有赶紧向中国的读者——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参见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8](p.533)}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在中共最高领导层已得到充分认识,并逐渐成为全党的自觉。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扩展为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成为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重要特色。

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自古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中国的文艺传统一直是入世的,关注现实人生的。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文学家以反映社会问题、揭露社会沉痾为己任,特别重视文化、文学的社会功能,对文艺的启蒙教化、宣传动员作用寄予厚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诗界革命、小说变革、文字改良,还是文体通俗化、戏剧改良,每一种文艺变革运动,都无不以“使民开化”、“开民智”、“鼓民力”为目标,以“改变国民精神”为己任。^①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重视文化问题,关注文化问题,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是“唤起民众”,动员民众。文艺和文化,始终被党看作是唤起民众、动员民众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就在《劳动教育问题》(1919年2月14、15日)一文中提出,文艺应该为广大劳工服务,“必须用通俗的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9](p.633)}因此,他特别希望青年“到农村去”,在他看来,“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

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9](p.648)}瞿秋白也断言:要把新文化运动推广到“极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10](p.21)}因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极为重视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

毛泽东毕生关注如何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问题。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说过:“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11](p.96)}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高度概括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8](p.708)}

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成形并成熟的标志性年份。从这一年春天起,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整风运动。这场历时三年的整风运动,其目的是要清算和肃清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是要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暴露出很多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延安文艺界的很多人是在抗战爆发后从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热情,但对自己手中的文艺如何为抗战服务,如何与工农兵结合,却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在文艺界内部,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争论、分歧和不团结现象,也存在宗派主义问题。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在整风中解决文艺界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党对一些文艺基本问题的深入探讨。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座谈会来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

^①1897年,严复、夏曾佑为天津《国闻报》撰写《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小说对于改变世道人心的巨大影响力,认为《国闻报》附印说部的宗旨应是“使民开化”。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阐述小说在“支配人道”方面“有不可思议之力”,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当时尚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鲁迅也感到:改变国民精神是当前第一要务,“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参见鲁迅的《呐喊·自序》)

题。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党内、党外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谈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大众化问题、思想改造问题,5月23日的讲话,又集中谈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所涉范围极广。“讲话”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是文艺的功能问题,文艺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5月2日开篇时就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2](p.49)]既然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那么“党的文艺工作”就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都“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如此,便得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12](pp.69,70)]等一系列观点和结论。既然文艺成为“党的文艺”,就必然要求文艺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阐发的思想,对日后党的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对后来新中国文艺管理体制和文化政策的形成,对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文化从少数贵族、文人学士的象牙塔里走向民间、走向大众,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的一个基本趋势。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现代化之梦,是理解文化为何在近现代史上与人民大众发生如此密切关系的关键。戊戌之后,严复在致张元济的信中写道:“复自客秋以来(按指戊戌变法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13](p.525)]严复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于是,致富图强,必先“开通民智”,便很快成为近代启蒙思想家们的共识。

如果说,在“五四”以前,先进的知识分子

尚把民众看作是思想启蒙的对象,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民众是社会变革可资利用的力量,那么到“五四”,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们,都在思想上日益倾向民众,他们渐渐将人民大众视为社会活动的主体,视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主力。1916年春,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写道:“……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在他看来,“多数国民”自觉、自动之运动,才能带来“国民根本之进步”。

“五四”以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由此,文化必须走向大众,为人民大众服务,便提升为一种理论的自觉。1923年,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号召有志于成为革命文学家的青年们投身革命事业,深入到工人农民士兵中去。随后,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9年后逐步开展并持续几年之久的大众文艺运动,1930年以后“左联”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强调和阐述,1940年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界普遍开展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以及抗战初期开始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入伍”、“下乡”运动,都是以“五四”为起点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继续,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文化工作的性质,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总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规定的。“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是中国革命的总任务。这个任务依靠谁来完成呢?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而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那么革命文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呢?在毛泽东看来,文艺要想“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就必须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亦即文艺“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

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8](p.708)}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除了肯定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外,还特别强调其性质是“大众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8](p.708)}由此可见,毛泽东所一贯强调的文艺、文化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使之成为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有力武器,都是从中国革命这个总任务出发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的这些基本观点,在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更全面、更深入的阐释和发挥。《讲话》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①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12](p.60)}根据这些基本思想,毛泽东在《讲话》中对革命文艺的总方针作了著名的表述:“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就这样,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当时面临的总任务中,引申出了革命文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指导原则。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当时使许多文化人思想上豁然开朗。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

后抗日根据地,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也因此成为后来建构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重要原则。

四、对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认识

无论是在什么历史时期,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都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政策就自然成为文化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认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形成和制定起了决定性作用。

中共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王明、秦邦宪(博古)、周恩来等人,都是知识分子。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所组成。^②尽管如此,党在知识分子问题和知识分子政策上历经反复,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的曲折历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4](p.3)}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对革命的态度和是否能够成为革命力量这个角度,来判断和确定社会各阶级以及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的,同理,也是从革命的角度来判断和确定知识分子的属性,是以这个社会阶层是否有助于革命的成功来制定其知识分子政策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虽然判定知识分子的主体是“小资产阶级”属性^③,但仍认为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人脱党,其中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再加上共产国际的影响^④,党内歧视、

①1942年5月28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介绍文艺座谈会的情况:“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②建党时全国50余名党员中,仅湖北有两名失业工人。参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页。正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属于传统统治精英后裔的年轻学者,开始游离于本身阶级之外,形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新阶层的核心——现代知识分子,现代革命运动的领袖正由此产生出来的。”只有当“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民大众的命运息息相关时,现代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章“背叛传统的知识分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将“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归入“小资产阶级”。

④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曾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都是那些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加入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如果我们回到这一点,则党内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就立刻明瞭了。”见《六大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1951年,第974页。

怀疑、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便占了上风。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认为,是“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告全党党员书》同时指出:“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智识阶级。”结论是:“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15](p.265)}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也严格要求“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下,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而肃清其中曾经在最近几(月)表现机会主义的分子。”^{[15](pp.304,305)}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再三强调要从组织上坚决改造党,指出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15](p.469)},因此“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15](p.471)},党内反知识分子倾向日益严重。

中共党内这种排斥、敌视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逐步有所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知识分子在抗战中表现出了很高的爱国热忱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知识分子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民主立场。^①中共中央给予青年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以极高的肯定,同时也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1935年12月17日,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观点,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智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16](p.605)}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毛泽东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吗?”^{[14](p.144)}“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14](p.151)}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党的基本策略应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14](p.155)},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民团结抗日的政治形势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发生很大的转变。^②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远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延安成了抗日救亡和流亡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向往的热土。1937至1938年,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一股历史

①1935年,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六千余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接着,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又组织南下宣传团,深入各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杭州、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南宁等地爆发了游行示威。各地爱国人士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一个抗日救国的高潮在全国迅速兴起。史称“一二九运动”。爱国青年学生和文化界进步人士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这场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参见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中共在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宣告:“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智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见《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611页。

潮流。^①诗人何其芳描述当时的情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17](p.174)}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8](p.618)}“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8](p.620)}^②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转变的标志性文件。^③同年12月9日，延安召开了“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1](p.256)}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

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强调：“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并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18](pp.180,181)}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很快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1940年11月，中共的“中下级干部，百分之八十五是新干部”，“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18](p.212)}

中共中央对到延安来的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文化人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包容和体谅。194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④《指示》要求：“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气量使自己能够同具有不完全同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应该估计到文化团体“同其他民众团体的不同性质”，

①1943年12月22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说，抗战初期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共有4万余人（西北局系统除外），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初中占31%，初中以下约占30%。这些知识分子到延安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根据地去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页；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②一年之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③这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框架下的知识分子政策转变，并不代表党对知识分子基本属性和基本特点的看法有多少改变。比如，毛泽东依然把知识分子“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认为他们虽然“有很大的革命性”，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末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末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642页。这才是党内对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

④这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党内指示。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293页。

“纠正有些地方把文化团体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看待及要他们担任一般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现象”；文化团体“内部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以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于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剧曲公演、公开讲演、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应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的地方，以供给文化人集会与娱乐之用”；“继续设法罗致与吸收大批文化人到我们根据地来，必须使我们的根据地不但能够让他们安心于自己的工作，求得自己的进步，而且也是最能施展他们的才能的场所”。《指示》的字里行间充满对知识分子细致入微的理解、关怀和体贴。那个时期，延安文化界的空气是自由的，文化人的精神是舒畅的。

到1941年和1942年，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频繁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不仅从1940年冬起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军备物资供应，而且调集50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我军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①在国际方面，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国际形势变得极为严峻。

严酷的斗争形势要求中共在思想和组织上实行更加集中统一的领导，从这个前提出发，对党的文化（文艺）工作进行集中统一和高度组织化的管理，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时，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也多了起来，党对知识分

子的政策也随之有所变化。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9](p.815)}

在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党内怀疑、歧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又卷土重来。以至于毛泽东1944年1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总结时，指出一种已经出现的严重倾向：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20](p.757)}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渐趋于稳定，其代表性文件是1942年9月17日发布的《总政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指示》将军队中的知识分子政策概括为“容”、“化”、“用”三个方面。“所谓‘容’者，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干部。所谓‘化’者，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所谓‘用’者，就是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指示》也指出了部队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在‘容’的方面，不积极争取知识分子者有之，排挤者有之，漠视歧视者有之，打击者也有之，这些缺点使我们不能更好地争取与容纳知识分子。在‘化’的方面，我们的教育工作还非常不够，或者操之过急，不积极地引导，只消极地打击，甚至动辄冠以小资产阶级等等头衔，使新知识分子不能接受我们的教育，甚至引起反感，与我们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或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采取放任政策。或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只采取书本的教条的教育，以为他们能够背诵一些抽象原则和

^①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见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术语,便算无产阶级化了。”“在‘用’的方面我们的缺点是:有些地方把很多的知识分子堆积在上层领导机关中当干事科员,这样使新知识分子得不到更实际更下层的锻炼。”《指示》同时也对知识分子提出了要求:“1.必须在思想上实行革命,清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确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2.必须重视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与工农打成一片,知识分子能否革命到底,取决于能否与工农劳动大众站在一起。3.重视实际工作与实践经验,决心抛弃满足于书本生活,不肯深入实际工作轻视经验的毛病。4.重视组织并培养自己的集体生活的习惯,扫除小资产阶级原有的无组织,无政府,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21](pp.439—441) 对知识分子“容”、“化”、“用”的政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知识分子“团结、改造、使用”政策的先声。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化思想和文化理论,是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发展、演变的思想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云 尔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J].新青年,1920,第八卷第四号.
- [4] 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 [7] 温济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J].学习与思考,1982,(4).
-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0]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1]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 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3] 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7] 何其芳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18] 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上接第11页)概括为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有着近9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既是以往历史经验的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永葆青春之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之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崛起腾飞之道。

责任编辑:美 景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 [10]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1]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ducation of Ideal and Faith, the Top Priority of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Socialist Core Value:

In the tim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ommunists firmly believe their common ideal of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top priority of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socialist core value and requires that the purpose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should be firmly kept in mind, Marxism should be carefully studied, awareness of potential danger should be stressed, the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should be carefully investigated,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should be stuck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ought emancip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and the courage to pursue truth as well as the attitude to revise mistakes should be kept. (LI Shen-m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Scientifically Treating Marxism in About 90 Years: The new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just celebrated her 60th Anniversary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60 years have astonished the whole worl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ing to be 90 years old. Why coul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ke glorious achievements? The essential reason lies in her adherence to the domestication of Marxism. In summary of the course of domestic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treatment of Marxism,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ree clarifies”: to clarify that the gist of Marxism is to seek truth from reality, which stresses that Marxist principl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o clarify that the essence of Marxism is science, which places stress on eradication of superstition, emancipation of thought and adherence to scientific view of Marxism; to clarify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is to open up (i.e.,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placing stresses on advancing with the time, with the world and continually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SHI Zhong-quan)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the New China's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System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deology.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we should first investigate its theoretical root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New China's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s, firstly,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ism as the guiding thought; secondly,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core of which is the issue of cultural position; thirdly, the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people, and the fourthly, the knowledge of the Communists about the intellectual's position and role. The knowledge of the above four aspects constitutes the party's basic cultural thought and theory. The basic frame of the New China and the basic cultural ideas in fact had become mature in the period of Yan'an. The cultural system at that period had determin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features and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of New China's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KUAI Da-shen)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and The Basic Ro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Party Construction: The major issue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party's construction is a new requirement to party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new change of the situation. The issue contains rich and profound meaning, which will exert great influence i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party's construction.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in party construction are as follow :guided by scientific theory, guaranteed by system,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s administrative ability and advancing feature, the whole situation as the essential aim, focusing all of thes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party construction can be improved. (XU Qing-yun)

To Cherish the Rich Min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yle Marxism: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hich is a rich mine, is a carrier and platform for Marxism to display its vitality. The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contain Chinese people's wisdom, struggle and innovation. Whether a theory contains scientific value, it can be judged by the following: first, it